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

謝明良*

【摘要】本文試圖將 1624 年荷蘭人在台灣台南安平地區所建築的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置於當時亞洲貿易網絡中予以考察。遺址所出歐洲陶瓷包括馬約利卡(Majolica)錫釉藍彩標本，推測是屬於所謂膏藥罐(Albarello)的殘片。其次，另有來自德國俗稱鬍鬚男(Batmannskrug)的帶把手鹽釉酒壺標本，從殘片所見阿姆斯特丹市徽模印貼花及其裝飾特徵，知其應是德國萊茵地區弗勒亨(Frechen)窯場所燒製之銷往荷蘭的作品。另外，遺址所見日本陶瓷則是九州肥前地區的所謂二彩唐津。從馬約利卡錫釉陶和弗勒亨類型鹽釉器，既見於印尼叭沙伊干(Pasar Ikan)、萬丹(Banten)或日本長崎荷蘭商館等遺址，結合文獻記載，不難得知遺留在台灣的歐洲陶瓷有可能是經由荷蘭人所攜來。至於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後半期的日本二彩唐津則不排除和鄭成功家族的陶瓷貿易事業有關。熱蘭遮城遺址不僅出土有中國陶瓷，亦見歐洲德國、荷蘭以及東南亞泰國、東北亞日本等地十七世紀陶瓷，而這樣的陶瓷組合，完全不見於中國考古遺址，故可說是當時以台灣爲據點的亞洲貿易交流於考古學上的反映。

關鍵詞：台灣　十七世紀　熱蘭遮城　尼德蘭馬約利卡　肥前陶瓷　德國炻器　貿易陶瓷

熱蘭遮城是 1624 年荷蘭人在今台南安平建築的城堡，初稱奧倫治城(Fort Orange)，1627 年奉荷蘭東印度公司總公司命令改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城堡本城於 1632 年已大體竣工，並以城堡為中心建立起荷蘭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迄 1662 年鄭成功攻佔熱蘭遮城驅逐荷蘭人之後，鄭氏仍長駐於此，並改地名為安平①。1683 年清軍大舉攻台，鄭克塽戰敗投降，清廷仍以熱蘭遮城為軍裝局，但熱蘭遮城卻因 1869 年英軍砲轟安平火藥庫而毀損部份城牆，不久，1874 年二鯤身修築炮台(億載金城)，也從城堡取走不少建材。熱蘭遮城於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曾經加以整建，既在城內構築海關長官宿舍，又於 1930 年將宿舍改建

*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① 有關熱蘭遮城築城的經緯，可參見：村上直次郎(韓石麟譯)，〈熱蘭遮城築城史話〉，《台南文化》3-3 (1953)，頁 11-13；3-4 (1954)，頁 45-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具拱廊形式的展覽館。戰後，城堡改稱「安平古堡」，並增建瞭望塔和史蹟公園。

2003 年，台南市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進行《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同年八月計畫共同主持人劉益昌在參酌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李德河教授利用透地雷達探勘熱蘭遮城遺址所得數據，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②。目前已發掘三個地點，編號為第 1、2、3 號探坑。所出遺物的質材種類頗為豐富，而以陶瓷的數量最多。初步觀察，陶瓷器的年代早自十七世紀，晚迄近現代，其時代跨幅基本上涵蓋了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以及戰後台灣等各個時期。

就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陶瓷的產區而言，無疑是以中國製品的數量居最大多數。除了著名的安平壺標本之外，至少還包括了江西省景德鎮的卡拉克瓷(Kraak Porcelain)(圖 1)，以及分別來自福建省漳州、德化、安溪或浙江省溫州等地瓷窯所生產的青瓷(圖 2)、青花瓷和釉上彩瓷等作品。此外，另有為數不少但窯口尚待辨認的施罩褐色、黑褐色釉的鐵釉系標本。雖然，台灣外島澎湖風櫃尾等地不止一次地採集得到十七世紀景德鎮卡拉克瓷或漳州窯等標本③，可惜均屬表採而缺乏正式的考古發掘手續。因此，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標本，是首次經由考古發掘証實台灣，特別是台灣本島確實存在這類裝飾布局來自歐洲人所設計的所謂卡拉克青花瓷器，值得重視。不過，本文的討論對象則是此次發掘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選定這個題目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十七世紀歐洲陶瓷是台灣本島考古的首次發現，讓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熱蘭遮城所見分別來自日本、中國、東南亞和歐洲這樣的陶瓷共伴組合，正是利用考古資料來印証文獻所載當時以台灣為據點的東亞貿易交流的具體例証。其次，相對於眾人耳熟能詳的中國陶瓷，國內對於歐洲或日本陶瓷似乎較為陌生，故有將資料公諸於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下，本文即依恃手頭所有的幾乎是令人汗顏的少數資料，針對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和日本陶

---

②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台南：台南市政府，2003)。我很榮幸受邀擔任該計劃的協同研究，參與出土陶瓷標本的鑑識工作。

③〈377 年 風櫃尾紅毛城 遺址確定〉〈1623 年颱風損堡 荷人強擄漁民修繕 遺址發現大批青花瓷器碎片為修堡人員餐具或清軍留下尚待鑑定〉，《聯合報》1999.11.10；盧泰康，〈澎湖風櫃尾荷據時期陶瓷遺物之考證〉，《故宮文物月刊》19 卷 5 期(2001)，頁 116-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瓷做一介紹。

一、遺址出土的荷蘭陶瓷

熱蘭遮城第 1 和第 2 號探坑出土的荷蘭陶瓷可大致區分為二類。一類是屬於廣義的馬約利卡(Majolica)系作品。此類標本計二件(TP1.III.1.L3e; TP2.V2.L3b)，胎質鬆軟，呈淡黃色調。其中一件內外施釉，外壁於胎上施罩白色失透性錫釉，而後在釉上以鈷藍進行彩繪，釉層較厚，會剝釉(圖 3)。其外觀藍彩雖可媲美青花瓷器，所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直接於器胎以鈷料繪飾而後施罩透明釉用高溫一次燒成。

一般而言，馬約利卡是對義大利錫釉陶的泛稱，其語源來自西班牙之馬約利卡島。由於十五世紀所謂 Hispano-Moreque Ware，即西班牙所燒造的伊斯蘭風格錫釉陶常經由馬約利卡島輸入義大利，因此馬約利卡原是指此類外觀帶特殊虹彩(Lustre)的陶器，至於將義大利錫釉陶稱為馬約利卡則要遲至十六世紀後半④。十五至十六世紀是義大利錫釉陶的鼎盛期，並影響到尼德蘭地區(the Netherlands)，位於該地區的今荷蘭德爾夫特(Delft)瓷場亦約於十六世紀開始燒造此類因傳輸轉運站而命名的錫釉陶器⑤，即所謂的荷蘭馬約利卡陶器。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兩片馬約利卡陶雖僅存殘片，但仍可觀察出是轆轤拉坯成形的瓶罐類，從器形推測，其中一件很可能就是被稱為膏藥罐(Albarello)的罐身部位殘件(圖 3 右)。法國特華(Troyes)市立醫院附屬藥局即有多件十七世紀的此類膏藥罐傳世至今⑥(圖 4)。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這類器高約十餘公分的小罐很可能是隨著荷蘭人勢力的擴張而攜至各地，如 1613 年沈沒於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的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沈船即見有這類小罐⑦，而

---

④ 森本義之，〈マヨリカ陶器〉，《世界陶磁全集》22(東京：小學館，1986)，頁 180。

⑤ Frits Scholten，〈オランダのマヨリカ陶と初期デルフト陶器〉，收入：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編，《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頁 106。

⑥ Liliane Sfeir Fakhri，〈リヨンと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マジョリカ陶器：日本の遺跡から出土したイタロ=フランス様式のリョンのアルバレロ〉，收入：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ャ國際陶芸博物館所藏《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頁 160。不過，該文作者將作品年代定在十六世紀末。

⑦ G.C.Vander Pijl-Ketel，*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p. 2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重要據點印尼萬丹(Banten)遺址也曾出土這類作品(圖 5) ⑧。

另一方面，除了傳世作品之外，至 1990 年代日本遺址所見荷蘭十七至十八世紀陶瓷標本計約十九件(片)，半數以上屬此類膏藥壺⑨。其次，依據 2001 年松本啟子的統計，則分別來自日本八處遺址，總計二十九件的馬約利卡陶器當中，所謂膏藥罐亦佔二十一件之多⑩。其中，年代最早的標本見於長崎縣大村市慶長三年(1598 年)建成的玖島城址⑪，以及[illegible]環濠都市日本慶長二十年(1615 年)地層⑫；不僅如此，在調查增上寺歷代德川將軍墓時也於卒歿於元和九年(1623 年)的德川秀忠墓發現同類作品⑬(圖 6)。結合出土有該類作品之其他遺址之性質或地望，則除了將軍墓、城、大名居宅之外，明顯集中於獲得幕府同意可與外國交易的「五所商人」所在地之長崎、[illegible]、大阪、京都，以及出島荷蘭商館遺址⑭。這樣看來，做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連接東南亞印尼諸國或東北亞日本重要基地的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有十七世紀荷蘭陶瓷似乎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此外，由於日本[illegible]市是因朱印船貿易而繁榮的都市，而台灣即是日本朱印船赴東南亞貿易時的據點，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也於寬永三年(1626 年)獲得朱印狀得以派遣船隻至台灣貿易⑮。值得一提的是，在 1636 年 5 月 30 日由巴達

---

⑧ 大橋康二等，〈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2 集(1999)，頁 76 及圖版 9 之 12。

⑨ 鈴木裕子，〈日本出土のオランダ陶器－17，18 世紀を中心に－〉，收入前引《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頁 138。

⑩ 松本啟子〈大阪城下町出土マジョリカ陶について〉，收入：前引《マジョリカ名陶展》，頁 169 表一。

⑪ 川口洋平，〈大村、玖島城出土のオランダ陶器〉《考古學ジャーナル》462 (2000,8)，頁 29 圖 2。另據同文頁 31 註(2)稱，遺物下限約於 1610 年代。

⑫ 松本啟子，〈大阪出土のオランダ色繪壺〉，《葦火》45(1993)，此轉引自：鈴木裕子，同註(9)，頁 141。

⑬ 鈴木尚等編，《增上寺德川將軍墓と遺品、遺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此轉引自：西田宏子，〈茶陶の阿蘭陀〉，收入：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1987)，頁 73。

⑭ 松本啟子，同註(10)，頁 171。

⑮ 永積洋子，《朱印船》(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頁 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維亞總督寄予末次平藏的信函中提到：「陶器和生絲的樣本或模型，收悉。我等遵循閣下的希望，擬將之送往祖國或其他地方製作。並且在接獲時隨即送往貴處」。結合 1633 年 5 月 13 日巴達維亞總督捎予松浦肥前守的書簡也提到：「關於荷蘭陶器，在新年將模型送往荷蘭於同地製作」，均屬日本向荷蘭訂製陶瓷的珍貴記事⑯。因此，不能排除台灣據點也參與了此一陶瓷訂製時樣本或成品交付等運送事宜。除此之外，1631 年 3 月 23 日荷蘭館長予台灣長官普特曼斯(Putmans)的信也說：「閣下明年如果方便的話，請為我等考慮黑砂糖少許、釀造啤酒用的瓶、飯桌所使用的上等和粗製陶器」。西田宏子認為，此一記事是日本荷蘭商館向台灣請求荷蘭陶瓷之証⑰。但事實如何？已難確認。其實，對於相信安平壺即啤酒壺的部分學者而言⑱，此一記事或許也可釋讀為日本荷蘭商館向台灣請求燒造於中國但熱蘭遮城以及日本平戶市和長崎市出島荷蘭商館均曾出土的安平壺？而台灣原住民部落遺址經常出土安平壺一事，或許也可以安平壺為盛酒容器之脈絡來予以理解。

另一方面，《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 1639 年台灣有「做為膏藥用給理髮師的 Cangan 布」;《熱蘭遮城日誌》也提到鄭成功攻陷熱蘭遮城時發現三百名病患正在醫院就診。雖然，當時的醫院概念和今日的情況大不相同，也就是說以當時歐洲而言，外科醫生其實是由理髮師所兼任，然而我們仍可藉由一幅十八世紀繪畫所見置放於外科醫生診療室中的所謂 Albarello 罐(圖 7)及其他用具，而得以遙想熱蘭遮城理髮兼外科醫的工作和醫院的情景⑲。如前所述，歐洲不少

---

⑯ 以上兩則檔案均轉引自：西田宏子，同註(13)，頁 78-79。

⑰ 西田宏子，同註(13)，頁 78。

⑱ 陳國棟曾經指出，江樹聲已懷疑法佗退音(Valentijn)說「三燒」(Sampsoe)即「中國啤酒」(Chinese Beer)的說法，因此在翻譯《熱蘭遮城日誌》時，將之譯成「麥酒」。陳氏在此一提示之上，結合西文「Shamsoo」即「三燒」，也就是經過三次蒸餾的米酒的說法，認為安平壺就是《熱蘭遮城日誌》所載「燒酒」的容器。參見，陳國棟，〈十七世紀的荷蘭史地與荷據時期的臺灣〉，《臺灣文獻》54 卷 3 期(2003)，頁 114-115。

⑲ 大橋康二，〈輸出した伊万里の醫療品〉，《目の眼》283 (2000.4)，頁 54-55。另外，正當我為巴城日誌中所謂膏藥用的「Cangan 布」到底指的是什麼而煩惱不已，並四下向人打聽時，很慶幸地從台大藝術史所博士生王淑津處得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國棟教授已考證「Cangan」主要是指中國製造的粗棉布，荷蘭人拿來銷往東京、廣南、柬埔寨和菲律賓群島；1625 年荷蘭人在台灣向新港社買到的第一塊土地就是用十五疋 Cangan 交換得到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醫院仍保存有這類膏藥罐，同時荷蘭阿姆斯特丹⑳或法國南部里昂(Lyon)特洛廣場(Terreaux Place)等十七世紀遺址也都出土了同類標本㉑。依據目前的資料看來，包括 Albarello 膏藥罐在內的所謂荷蘭馬約利卡陶器的燒造地點，除了荷蘭北部(Noord-Nederland)、荷蘭南部(Zuid-Nederland)之外，如安特衛普(Antwerpen)等歐洲其他地區亦有生產㉒，但詳情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補充。可確定的是，東方台灣或日本、印尼等地遺址出土的這類作品應該是由荷蘭所攜來的。

二、遺址出土的德國陶瓷

熱蘭遮城第 2 號探坑出土的德國陶瓷是來自該國萊茵(Rhineland)地區窯場所燒製的鹽釉陶瓷。探坑所出此類標本計有壺把、器身以及器身所飾模印貼花等部位殘片(圖 8，TP2-AL2c)，據此可以復原得知作品至少包括了俗稱鬍鬚男(Bartmannskrug, Baardman)的帶把酒壺(圖 9)。酒壺以轆轤拉坯成形，壺頸肩部位浮雕落腮鬍人面，同時經常於顏面下方以及壺腹側面裝飾各式紋章，鬍鬚男一名即來自壺頸肩部位裝飾的人面圖紋。作品的製作工序是：於拉坯成形的器身飾模印貼花，而後整體施抹一層褐色化妝土，待入窯燒至約攝氏一千兩百度高溫時，投鹽入窯，以氧化焰燒成。如此一來，鹽與自然灰就結晶形成所謂的鹽釉。㉓

萊茵地區「鬍鬚男」樣式酒壺延續至近代仍有燒造，但主要燒製於十五至十七世紀，當中又以科隆(Cologne)及其近郊的弗勒亨(Frechen)等兩處窯場製品最為著名。一般而言，科隆類型之浮雕顏面生動，表情誇張，同時又於壺身

參見：陳國棟，〈轉運與出口：荷據時期貿易與產業〉，《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 69-70，以及同氏，〈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 與臺灣〉，慶祝曹永和院士八十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0)。承蒙國棟兄惠賜論文影本，謹誌謝意。

⑳ 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江戸・長崎・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ニューヨーク—》(東京：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等，1996)，頁 120 圖 1-98。

㉑ Liliane Sfeir Fakhri, 同註(6)，頁 160-165。

㉒ 松本啟子，同註(10)，頁 168。

㉓ 前田正明，《西洋陶磁物語》(東京：講談社，1980)，頁 154-1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貼飾華縟的浮雕植物花卉；弗勒亨類型的浮雕貼花則顯得簡略，多數作品除了人面下方或壺腹兩側的紋章貼花之外，留白無其他裝飾。此外，同樣位於萊茵地區的衛斯特維德(Wasterwald)窯場作品則又多加飾鈷藍彩㉔。此次熱蘭遮城出土的殘片當中雖亦見裝飾有鈷藍彩的標本(同圖 8)，不過從其花紋平板，貼花印紋簡略以及整體釉質看來，熱蘭遮城遺址目前所出標本均屬弗勒亨地區窯場所生產㉕。應予一提的是，前述出土有荷蘭馬約利卡陶的印尼萬丹㉖，或日本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等遺址也都出土有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標本㉗(圖 10)。特別是日本至西元 2002 年為止的多處考古遺址所出總數達 115 件(片)的標本只見弗勒亨類型㉘。換言之，截至目前可確認之東方遺址所出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似乎限於弗勒亨類型，不久前公布的台灣外島澎湖風櫃尾表採的殘片㉙，也屬同一類型。

就印尼和日本考古遺址出土該類標本的年代而言，前者之萬丹遺址因伴出土十七世紀的安平壺、卡拉克瓷、漳州窯等中國陶瓷和日本肥前瓷窯殘件，故總數約 40 個體的弗勒亨類型標本之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㉚。至於日本出土有該類標本的考古遺跡則限於長崎縣境內，如伴出有荷蘭馬約利卡膏藥罐的興善町遺跡八尾邸就曾出土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標本㉛，但是無疑還是以荷蘭商館所在地的出島出土數量最多，長崎市街和平戶市亦見出土例。後者平戶荷蘭商館年代下限為 1641 年，故商館遺跡出土之鬍鬚男酒壺標本

㉔ David Gaimster, *German Stoneware 1200~1900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7, pp. 251-253.

㉕ 有關萊茵地區鹽釉陶瓷的分區以及科隆、弗勒亨等窯場作品的樣式特徵參見：David Gaismter, 前引書，頁 191-193；208-211。另外，弗勒亨鹽釉陶窯址出土標本可參見：Karl Göbels, *Keramik—Sdjerben aus Frechen*, Rheinland—Verlag Gmbh, Köln, 1980. 以上這筆德文資料承蒙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陳玉秀女士提供，她還為我中譯了部份文字，謹致謝意。

㉖ 大橋康二等，同註(8)，頁 77。

㉗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護岸石垣復元事業に伴う發掘調查及び工事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1)，頁 64 圖 38 之 60。

㉘ 櫻庭美[illegible]，〈鬚德利〉，《國華》1295 號(2003)，頁 27。

㉙ 盧泰康，同註(3)，頁 128。

㉚ 大橋康二等，同註(8)，頁 77。

㉛ 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同註(20)，頁 84 圖 2 之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相對年代應在1641 年之前[32]。這樣看來，目前東亞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區燒製的所謂鬍鬚男酒壺既限於弗勒亨類型，其相對年代亦集中於十七世紀，不僅如此，其考古遺跡也都和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熱蘭遮城是荷蘭人自毀外島澎湖風櫃尾城堡於 1624 年拆遷至安平構築的城堡，而上述兩座城堡遺址均發現有弗勒亨類型陶瓷，這很難說是偶然，而應該說台灣出土例亦如同印尼、日本般，透露出此類德國陶瓷與荷人的緊密關連。關於這點，我們從 1609 年沈沒於幾內亞灣南部的模里西斯號（*Mauritius*）沈船[33]，或前引發現有荷蘭馬約利卡陶的 1613 年白獅號等兩艘荷蘭東印度公司沈船都打撈出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34]，可以推測印尼、台灣和日本等國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區陶瓷應是由荷蘭人所帶來的。此一推測也符合以往學界推測德國萊茵地區陶瓷，於十七世紀荷蘭社會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即荷蘭國內考古發掘已證實中世紀末期荷蘭陶瓷器用頗多是由萊茵地區窯場所輸入，並且其中就包括不少弗勒亨類型的鬍鬚男酒壺。[35]

或許是由於首先出現於德國萊茵地區的鬍鬚男酒壺外觀所呈現出的詼諧裝飾趣味，深受歐洲人們的歡迎，致使比利時或英國等地的窯場起而倣效，燒製類似的作品。但另一方面，萊茵地區的窯場似乎也接受訂製，故傳世的不少鬍鬚男樣式酒壺上的貼花紋章內容，除見有英國、丹麥或奧地利等國王室家徽，還可見到科隆甚或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36]。後者阿姆斯特丹市市徽乃是由三個垂直排列的「╳」所構成，分別表示阿姆斯特丹市的三個剋星：水、火和黑死病，是該市十六世紀以來迄今日的市徽（圖 11）；也是阿姆斯特丹市市民自我期許

---

[32] 櫻庭美[illegible]，同註(28)，頁 27。另外，有關日本遺址出土鬍鬚男酒壺標本的考察，可參見同氏，〈江戸時代に舶載されたライン[illegible]器酒器についての一試論〉，《武藏野美術大學研究紀要》30 (1999)，頁 101-114。

[33] M. L'Hour and L. Long, The wreck of an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 Indische Companie': The Mauritius (160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e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9-1 (1990), p. 68。

[34] G. C. Vander Pijl-Ketel, 同註(7)，頁 246-247。

[35] Jan M. Baart,〈アムステルダムの歴史と考古學〉，收入：小林克編，《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日蘭出土資料の比較－》（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2002），頁 281-282。

[36] 前田正明，同註(23)，頁 163。另外，圖版可參見：David Gaimster，同註(24)，頁 214 圖 53，頁 215 圖 56，頁 216 圖 57，頁 218 圖 62，頁 220 圖 67 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英勇、果決、慈悲之人格稟賦。值得留意的是，台南熱蘭遮城第 2 號探坑出土的弗勒亨類型鬍鬚男樣式酒壺壺身所見貼花紋章雖已殘缺不全，但仍可清晰地辨識出紋章的主題乃是由「╳」紋所構成(同圖 8 右)。若參照國外收藏之具有類似貼花紋飾的作品[37]，可以確認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德國萊茵地區陶瓷當中，正巧包括裝飾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作品在內。雖然流傳於世的裝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不止一件，彼此的相對年代也不相同，其既包括十六世紀中期(同圖 9，1560 年)、十六世紀後期(圖 12)的作品，也有可晚到十七世紀早中期的例子，不過現藏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之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徽的作品(圖13)，由於市徽周邊之細部裝飾圖紋亦和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同類標本之紋飾幾乎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認為兩者屬於同一時期、相同窯場所燒製。其次，從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品壺口沿部位由歐洲金工師所裝鑲的具有時代風格的金屬壺蓋看來，學界推測該鹽釉壺應係 1590-1620 年間萊茵瓷場售往荷蘭的典型作例[38]。此一年代觀，可以做為訂定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同類標本的年代參考依據。

三、遺址出土的日本陶瓷

熱蘭遮城遺址所見日本陶瓷，是第 3 號探坑出土的十七世紀九州肥前地區的唐津燒(TP3-B-IV.2 L3d; TP3-A-II.2 L3f)。出土殘片為盤類器壁部位，內壁以白色化妝土刷抹波浪形複線紋飾帶，再於上方飾以銅呈色的綠彩和以鐵為發色劑的褐彩而後施罩透明釉燒成，匠心獨運，是肥前地區具有特色的產品，一般稱為「二彩唐津」(圖14)。

唐津燒開窯於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甚或更早的十六世紀中葉[39]，很可能與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所擄回陶工在今佐賀、長崎兩縣松浦地區築窯燒瓷的傳承有

---

[37] Keramik Museum Frechen 收藏有年代分別在 1560 年(A95)、1594 年(A242)之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鬍鬚男酒壺。詳參見該館網址資料(www.rheinische-keramik.de)。此感謝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陳玉秀女士和弗勒亨陶瓷博物館研究員 Kleine 女士的教示。另外，David Gaimster，同註(24)，頁 220 亦揭示一件相對年代在 1600-1650 年間的作品。

[38] 《特別展 阿蘭陀―鎖國下のエキゾチシズム―》(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1996)，圖 69。櫻庭美[illegible]，同註(28)，頁 27 及圖版 6。神戶市立博物館編，《神戶市立博物館館藏品目錄》美術の部 10 工芸品(神戶市立博物館，1993)，頁 10 第 61 號。

[39] 大橋康二，《肥前陶磁》(東京：ニューサイエンス社，1976)，頁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以地域劃分，唐津燒可區別成松浦系、武雄系、多久系和平戶系等幾個窯系[40]，其中松浦系之椎の峰等少數窯址雖亦見加飾褐、綠兩彩的作品，但所謂「二彩唐津」主要燒造於武雄系的川古窯の谷新、燒峰上、內田大谷、弓野山、庭木山、小田志山、黑牟田和櫨ノ木等窯場；唐津燒同時也肩負了十七世紀日本陶瓷外銷的任務，於印尼、泰國、東甫寨、婆羅洲、汶萊等東南亞國家都曾出土[41]（圖 15）。其中，印尼萬丹遺址曾出土荷蘭馬約利卡陶和德國萊茵地區弗勒亨類型之鬍鬚男酒壺一事，已如前所述。應予一提的是，儘管唐津燒的裝飾技法豐富，但東南亞國家出土例則限於所謂的刷毛目和二彩唐津[42]，此次台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標本亦不例外，屬當中的二彩類型，這似乎顯示了當時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的緊密連繫，致使兩地遺址出土的陶瓷組合較為相近，甚至連個別瓷窯作品的種類也有雷同之處。

依據近年的編年成果，二彩唐津始見於 1610-1650 年(II 期)，但印尼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出土的二彩唐津和刷毛目等大盤則是屬 1650-1690 年(III 期)的作品[43]。大橋康二在作品編年的基礎之上，結合東南亞以西未見此類作品出土例等現象，指出東南亞遺址所出二彩唐津，恐非經由荷蘭船舶所運達[44]。關於這點，我們不應忘記，在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二彩唐津之前的 1980 年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已曾發現日本肥前陶瓷，並且是屬於十七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青花瓷標本[45]，而新近公布的台南縣新市鄉社內遺址也出土了十七世紀後半日本肥前青花瓷器[46]。野上建紀亦撰文指出，上述兩處遺

---

[40] 佐藤雅彥編，《唐津》日本陶磁全集 17（東京：中央公論社，1976），頁 53-54。

[41] 中里太郎右衛門，〈唐津〉，收入：《世界陶磁全集》7（東京：小學館，1980），頁 159-161。

[42] 中里太郎右衛門，同上註，頁 161。

[43] 盛峰雄，〈陶器の編年〉，收入：《九州陶磁の編年—九州近世陶磁學會 10 週年紀念—》（佐賀縣：九州近世陶磁學會，2000），頁 11-12。

[44] 大橋康二，〈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收入：《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縣：九州陶磁文化館，1990），頁 112。

[45] 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3（1993），圖版 11；以及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台灣史研究》3-1(1997)，頁 237-238。

[46] 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台南：台南縣政府，2004），頁 33 圖 27，頁 50 圖 75。感謝遺址發掘計劃主持人李匡悌兄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址以及最近在台南市南安路地下街工地採集得到的肥前青花瓷器的年代均在1660-1680 年之間，標本並可區分出：主要銷往東南亞地區的繪有魚躍龍門的所謂「荒磯紋」碗，以及多輸往歐洲或西亞地區的卡拉克樣式青花盤等兩種類型(圖16)。[47]眾所周知，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台灣，翌年與荷蘭簽訂開城協約，驅逐了荷蘭在台勢力，因此遺留在台灣的 1660-1680 年代的日本陶瓷不會是由荷蘭船自日本所攜至的。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左營等遺址發現的日本青花瓷的年代正巧屬於清廷為杜絕海上走私貿易，同時企圖孤立鄭成功而於 1661 年採行遷界措施，至 1683 年清軍進攻台灣，鄭克塽戰敗投降，翌年頒佈展海令允許人民出海貿易這一期間的作品。換言之，正是日本肥前陶瓷因中國紛亂的局勢而順勢取代中國陶瓷外銷市場這一期間的作品。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相傳是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的所在地，而社內遺址推測或為平埔族西拉雅之新港社，看來上述幾處遺址所出十七世紀後半的日本陶瓷，很可能和當時以台灣為根據地的鄭氏集團有關。事實上，[48]井隆已曾指出鄭氏集團及其後繼者才是十七世紀日本陶瓷外銷的最大功臣[48]，近年同氏又援引168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給廈門商館長的書信，證實鄭氏商船確曾赴日本購買陶瓷[49]。就此而言，熱蘭遮城和左營遺址會留下此一時期的日本陶瓷或許可說是極為自然之事。此外，台南市民族文物館亦舊藏有年代約在 1650-1670 之間的日本伊萬里青花小瓷罐[50](圖17)，結合前述考古發掘遺物，表明十七世紀日本的陶瓷似有不少是先運抵台灣而後再外銷至東南亞或歐洲等地，泰國 Thao Khot 遺址即曾出土與前引台南市民族文物館完全一致的作品[51](圖18)，但其是否經由台灣所輾轉傳入？目前已不得知。

賜報告書。

[47] 野上建紀等，〈台南出土の肥前磁器—17 世紀における海上交易に關する考察—〉，《金大考古》48 (2005)，頁6-10。

[48] [48]井隆，〈肥前陶磁の輸出と鄭氏、バンテン王國〉，《東南アジア—歷史と文化—》22 (1996)，頁82。

[49] [49]井隆，《「伊萬里」からアジアが見える》講談社選書メチエ(東京：講談社，1998)，頁236-237。

[50] 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編，《民族文物館藏品選集》(台南市政府，1989)，頁 6 圖 12；另外，作品的年代可參見：大橋康二，〈鄭成功とイマリ〉，《目の眼》261(1998)，頁66。

[51]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同註(44)引書，頁151圖3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小　結

以上，本文粗略地介紹了新近發掘之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結論是：熱蘭遮城遺址所見以中國陶瓷為主軸但亦包括部分來自日本、歐洲和東南亞等地陶瓷的組合特徵，可說是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台灣在東亞貿易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是荷蘭人、鄭氏集團及其後繼者在台活動營生的具體遺留。

相對於中國考古遺址目前未見這樣的陶瓷組合，東南亞印尼等地遺址所見陶瓷種類則和台灣有著驚人的類似性。比如說，發掘雅加達灣西部沿岸叭沙伊干(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倉庫和舊河道遺跡時，不僅出土有和熱蘭遮城遺址類似的德國弗勒亨類型酒壺和日本二彩唐津，伴出的中國卡拉克瓷和漳州窯系作品也和熱蘭遮城遺址標本相近[52]。其次，印尼萬丹遺址既見弗勒亨酒壺、二彩唐津或荷蘭馬約利卡陶，也出土了卡拉克瓷、漳州窯，以及熱蘭遮城遺址最為常見的來自中國福建的所謂安平壺[53]，台灣與東南亞考古遺址出土陶瓷的類似性委實讓人印象深刻。此外，遺留在台灣民間古厝的十七世紀越南和泰國陶瓷，也說明了當時臺灣和東南亞之間活絡的貿易往來。[54]

另一方面，台灣與日本遺址出土陶瓷也頗有雷同之處，而就與本文主旨相關的歐洲陶瓷而言，萊茵地區弗勒亨陶瓷標本集中出土於荷蘭商館所在地的長崎縣，而熱蘭遮城遺址大量出土的安平壺於日本的出土分布也是集中於長崎地區，這表明上述兩類商品應和荷蘭人直接相關。不過，本文所關心的，還在於日本獲得歐洲陶瓷的過程中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問題。如前所述，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表明，日本不止一次地主動向荷蘭要求購買特定器形種類的陶瓷，當中

---

[52] 三上次男，〈パサリカン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2 (1982)，頁 111-120。

[53] 大橋康二等，同註(8)，頁 47-81。另外，印尼 Sulawesi 島 wolio 城遺址亦見安平壺、德國鹽釉灰石器、日本肥前陶瓷等標本，此參見：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ンター，《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據點バンテン・テイルタヤサ遺跡の貿易陶磁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20 (2004)，頁 185 圖 3、圖 4 等。

[54] 謝明良，〈陶瓷所見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故宮文物月刊》242 (2003)，頁 24-39。另外，熱蘭遮城日誌中也有許多相關的記載，如 1632 年裝載有鹿皮和兩仟餘件粗瓷器等貨物由暹羅赴日本貿易的戎克船，即因季風關係而停泊台灣。此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 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既有德爾夫特瓷場作品，還包括德國萊茵地區科隆瓷場的水注[55]。不僅如此，還屢次託付樣本模型要求荷蘭瓷場依樣製作，後者計有各式碗和帶把杯。除此之外，西田宏子等日方學者還認為在所謂膏藥壺(Albarello)的作品當中，包括一類口徑和底徑超過十公分，壺身經常繪飾幾何紋或煙草葉紋(圖19)，被日本茶道界用來充當茶會時，裝盛洗濯茶碗、茶筅廢水或補給茶釜用水的「水指」，即是日本向荷蘭訂製的特殊茶道具，故目前除了日本遺跡之外，包括原產國荷蘭在內的歐洲各國均未見到[56]。儘管西田氏的訂製說略有武斷之嫌，不過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荷製馬約利卡膏藥壺雖僅存壺身殘片，但仍可識別出壺身係繪飾煙草葉紋(同圖3右)。值得留意的是，國立台灣博物館也收藏了一件該館於1940年代接收自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底徑復原超過十公分，尺寸較大足堪作為水指使用的荷製馬約利卡陶殘片(圖20，AH368-424)。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於1908年，至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收期間積極從事台灣自然、人文標本的蒐集工作[57]，因此該殘片雖乏確實的出土或採集紀錄，但從原收藏單位的性質看來，其極可能是得自台灣本島。如果此一判斷無誤，則日本出土的此類尺寸特殊的茶道水指當中，可能有一部份是經由台灣荷蘭據點而後再轉運抵達的。這不由得會讓我們再次的連想到前述1636年向荷蘭訂製陶瓷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58]，他同時也是繼著名的李旦和華宇兄弟之後，獲得朱印狀得以派遣船隻來台灣的朱印船貿易家。

以上本文粗略地考察了2003年發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在此要提請讀者留意的是，遺址所出陶瓷標本仍然是以中國製品佔絕大多數，與此同時，也包括少數幾件東南亞陶瓷標本。其次，就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陶瓷而言，除了本文已涉及的十七世紀標本之外，亦可見到晚迄十

---

[55] 西田宏子，同註(13)，頁82-83。

[56] 西田宏子，同註(13)，頁84以及同氏，〈阿蘭陀—日本傳世のオランダ陶器〉，收入前引《*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頁125-126。不過，松本啟子或Cristiaan J. A. Jörg等人並不同意西田氏的訂製說。詳參見：松本啟子，〈大阪城下町出土のオランダ壺の源流をもとめて〉，《大阪市文化協會研究紀要》2 (1999)，頁350。

[57] 有關台灣總督府的角色和功能，可參見：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台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 (1997)，頁241-273。

[58] 近年Liliane Sfeir Fakhri認為日本出土的膏藥罐是由法國里昂的耶穌會士赴日傳教時所攜入。參見註(6)，頁165。但由於同氏並未出示任何證據，本文不予採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世紀的作品。眾所皆知，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台灣，翌年與荷蘭簽定開城協約，驅逐了荷蘭在台勢力，至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軍進攻台灣才結束了鄭氏祖孫三代在台統治。清朝殖民台灣兩百年之後又因日清甲午戰爭，清軍潰敗，而於 1895 年和日本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此後要到 1945 年中國國民黨軍隊登陸台灣，才又結束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因此，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十九世紀歐洲陶瓷到底是經由何種途徑而傳入？此一涉及消費群的議題值得略予探討。以台大藝術史所博士生王淑津在大量的出土遺物中識別出的兩件白陶煙斗殘件為例，其中一件屬煙管(stem)部位殘件(TP1-I4, L3f)，管部壓印有「□LAS□」陰紋字銘(圖 21)。我很幸運地檢索到日本東京新橋車站遺址曾出土帶「DAVIDSON GLASGOW」完整銘記的同類白陶煙斗(圖 22-a)，可知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LAS□」字銘應是 GLASGOW 的殘部，亦即均是 1862-1911 年設廠於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之 Thomas Davidson 公司出產的陶煙斗。[59]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另外一件白陶煙斗亦僅存部份火斗(bowl)和一小截殘柄(圖 23，(TP3B-IV1L3g, F6-L2))，但仍可輕易地觀察出作品係模製成形，斷面胎土潔白細膩略泛黃色調。另從填塞煙草的火斗器表留有多道縱向捺磨痕跡可知作品曾經打磨工序，故打磨部位微泛木頭般溫潤的光澤。這類俗稱為 Clay Pipe 的陶煙斗最早出現於十六世紀後半的英國，但由於英國的禁煙政策造成陶煙斗製造業移往荷蘭發展，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已成為歐洲最重要的陶煙斗製造和交易中心[60]。另一方面，隨著 1668 年位於海牙附近的豪達(Gouda)市當局宣布營運煙斗市場以來，到了十八世紀豪達已取代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成為世界陶煙斗製造都市。儘管十七世紀初期英國和荷蘭生產的陶煙斗之造型相近，不易區別，但之後於荷蘭製造的陶煙斗既可經由火斗的造型和尺寸大小予以年代區分[61]，至於經常見於火斗下方突出之跟部上方的認證標誌，以及跟部截面所見作坊商標(heel with heel marks)更是提供編年的絕對依據(圖 24)。就此而言，此次熱蘭遮城出土的白陶煙斗跟部即印有豪達市政府的認證標記，另從跟部

[59] 福田敏一，《新橋駅發掘—考古學からみた近代》(東京：雄山閣，2004)，頁 154-155。

[60] 谷田有史，〈日本のきせるとクレイパイプ〉，收入：前引《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日蘭出土資料の比較—》，頁 223。

[61] Wiard Krook,〈オランダで發掘されたクレイパイプ〉，收入：前引《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日蘭出土資料の比較—》，頁 236-2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底面所飾魚形作坊標幟，可知其是來自豪達市的以魚形為品牌的作坊所生產。其次，從豪達市標記下方另見一小凸圓點，結合煙管部份所施加的繩紋印花裝飾，可以推測標本的年代約在 1850 年至 1940 年之間[62]。換言之，上述兩件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白陶煙斗的相對年代在於清朝據台後期至日治時期。然而，到底是清人抑或日本人才是此一白陶煙斗的使用者？關於這點，我們從日本九州出島荷蘭商館遺址以至關東地區不少遺址均出土有十八至十九世紀荷蘭白陶煙斗可知，日本當時頗風行以白陶煙斗喫煙的習俗，故不排除熱蘭遮城遺址所出來自荷蘭豪達市的白煙斗是由日本人輾轉攜入台灣的。換言之，出土標本的消費者或可指向日本人。另外，我們也應留意熱蘭遮城所出荷蘭製白陶煙斗是屬於豪達市製品中所謂「'fijne' pipe」，即以瑪瑙石研磨器表使之產生溫潤光澤的僅次於最高級「'porceleyne' pipes」的上級品，而若依據 1700 年豪達市煙斗製造工會的規定，此一等級陶煙斗的煙柄長度不得短於 53 公分[63]（圖 25），這對於復原熱蘭遮城標本器形甚至判定消費族群的經濟能力或亦有所助益。最後，我想以提問的方式做為本文的結束。那就是：從 1997 至 1998 年度日本發掘出島荷蘭商館遺址時出土的白陶煙斗火斗部位標本即達六百餘件（圖 26），煙柄殘件更有數千件之多[64]。由於陶煙斗容易毀損，因此鈴木達也推測當時在日荷蘭商館員每人一年間所消費的煙斗約 10 支[65]，應該算是合理的估算。就此而言，姑且不計荷蘭在台士兵，僅就鄭成功和荷蘭簽定開城協約時大員議會人員暨單位主管人數計 48 人，設若當中有半數人喫煙再加計荷蘭據台三十多年，則荷蘭商館員在台消費毀棄的陶煙斗至少有 7000 件。然而，此次發掘熱蘭遮城遺址卻未發現屬

---

[62] Don Duco, *Merken van Goudse Pijpenmakers 1660-1940*, Cochem/ Poperinge, 1982, p. 111。此轉引自：谷田有史，同註(60)，頁 225 以及小林克，〈オランダからきたクレイパイプ〉，收入：江戸遺跡研究會編，《甦る江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1），頁 281 圖 16。

[63] Wiard Krook，同註(61)，頁 249-250。

[64] 岩崎均史，〈出島和蘭商館跡（平成 9、10 年度）出土のクレイパイプ〉，收入：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荘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頁 187。

[65] Bert van der Lingen，〈1998、1999 出島發掘作業による出土のクレイパイプ調查報告〉，收入：上引《出島和蘭商館跡》，頁 242 鈴木達也的解說。另可參見，鈴木達也，〈オランダ商館內消費財としてのクレイ・パイプ—VOC 供給開始とキセルからの展換—〉，《日蘭學會會誌》28-1 (2003)，頁 59-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十七世紀的煙斗殘件，這似乎暗示了荷蘭商館員的主要活動地點仍有待考古發掘來證實？

〈後記〉

本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主持此次熱蘭遮城考古發掘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以及他的兩位助理：王淑津(台大藝術史所博士生)和顏廷仟(台大人類學系博士生)。事實上，我和他們三人曾經合作並共同具名於史語所所主辦的《台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論文發表會》宣讀了一篇標題和內容都和本文相近的文章，本文即是在此一共同研究的基礎之上增補而成的。在增補的過程當中，我很幸運地從扇浦正義先生所惠賜的大作中間接獲知有關白陶煙斗的相關著述；又承蒙國立台灣博物館李子寧組長惠賜該館珍藏的荷蘭膏藥罐彩圖；陳玉秀女士教示我德國弗勒亨陶瓷博物館的網址並惠賜窯址報告；王淑津和彭盈真兩位同學則又在她們赴日考察期間為我影印論文。如果沒有以上的幫助，本文是無法完成的。

（責任編輯：廖佐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說明

圖 1　卡拉克樣式青花瓷（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2　漳州窯劃花青瓷盤殘片（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3　荷蘭 Majolica，右為膏藥罐(Albarello)殘片（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4　法國特華(Troyes)市立醫院傳世的 Albarello

圖 5　—a 印尼萬丹(Banten)出土的 Albarello

—b 同上線繪圖

圖 6　德川秀忠將軍墓(1623 年)出土的 Albarello

圖 7　18 世紀繪畫所見外科醫院中的 Albarello

圖 8　貼飾阿姆斯特丹市徽的德國鹽釉酒壺（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9　德國鬍鬚男(Bartmannskrug)鹽釉酒壺(1560 年)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圖 10　日本長崎縣興善町遺址出土鬍鬚男鹽釉酒壺破片

圖 11　帶有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 公司徽章和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麻袋(局部)

圖 12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1594 年)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圖 13　—a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側面)

—b 同上(正面)

—c 同上(局部)（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彭盈真攝影）

圖 14　—a 肥前二彩唐津

—b 同上(背面)（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15　二彩唐津　泰國 Nakon si Thammarat 出土

圖 16　台南出土肥前青花瓷(1660-1680 年)

圖 17　台南市民族文物館舊藏肥前青花小罐

圖 18　泰國 Thao Khot 寺出土肥前青花小罐

圖 19　是煙草華紋的 Albarello（漆蓋為後世所加）

圖 20　—a 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藏的 Albarello

—b 同上(斷面)

—c 同上(器底)

圖 21　陶煙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22　陶煙斗 —a 東京新橋車站遺址出土

—b 東京汐留遺跡出土的陶煙斗

圖 23　—a 陶煙斗

—b 同上(跟部)（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4　—a 陶煙斗線繪圖

—b 豪達市市徽

圖 25　17 世紀荷蘭靜物畫中的陶煙斗

圖 26　日本出島荷蘭商館遺址出土陶煙斗

圖 27　荷蘭人喫煙圖(1801-1804 年) たばこと鹽の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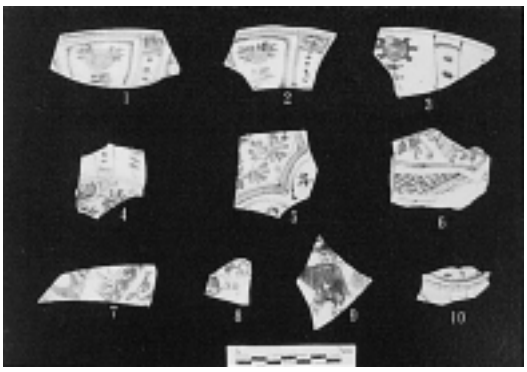


圖 1　卡拉克樣式青花瓷（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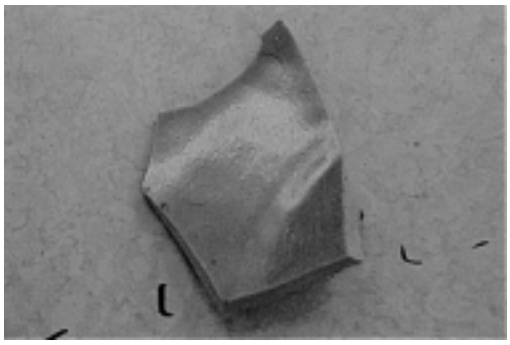


圖 2　漳州窯劃花青瓷盤殘片（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3　荷蘭 Majolica，右為膏藥罐（Albarello）殘片（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4　法國特華（Troyes）市立醫院傳世的 Albarell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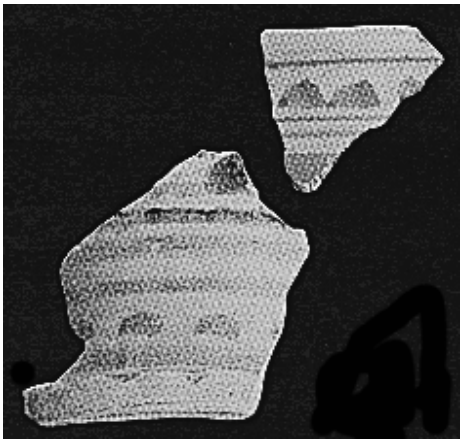


圖 5-a　印尼萬丹(Banten)出土的 Albarel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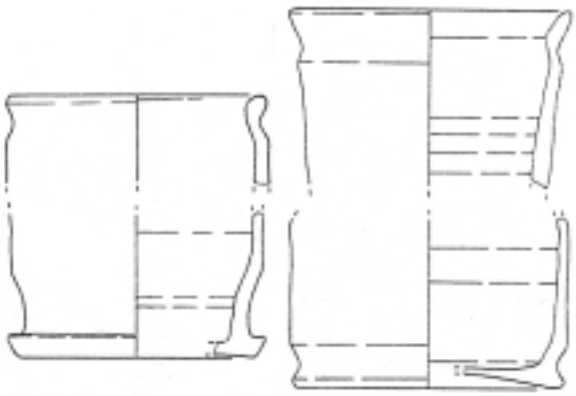


圖 5-b　同上線繪圖



圖 6　德川秀忠將軍墓(1623 年)出土的 Albarello



圖 7　18 世紀繪畫所見外科醫院中的 Albarell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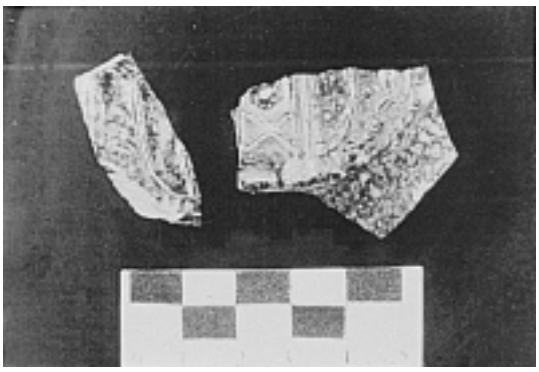


圖 8　貼飾阿姆斯特丹市徽的德國鹽釉酒壺（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9　德國鬍鬚男(Bartmannskrug)鹽釉酒壺(1560 年)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圖 10　日本長崎縣興善町遺址出土鬍鬚男鹽釉酒壺破片



圖 11　帶有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 公司徽章和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麻袋(局部)



圖 12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1594 年)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3-a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側面）



圖 13-b　同上(正面)



圖 13-c　同上(局部)（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彭盈真攝影）



圖 14-a　肥前二彩唐津



圖 14-b　同上(背面)（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15　二彩唐津（泰國 Nakon si Thammarat 出土）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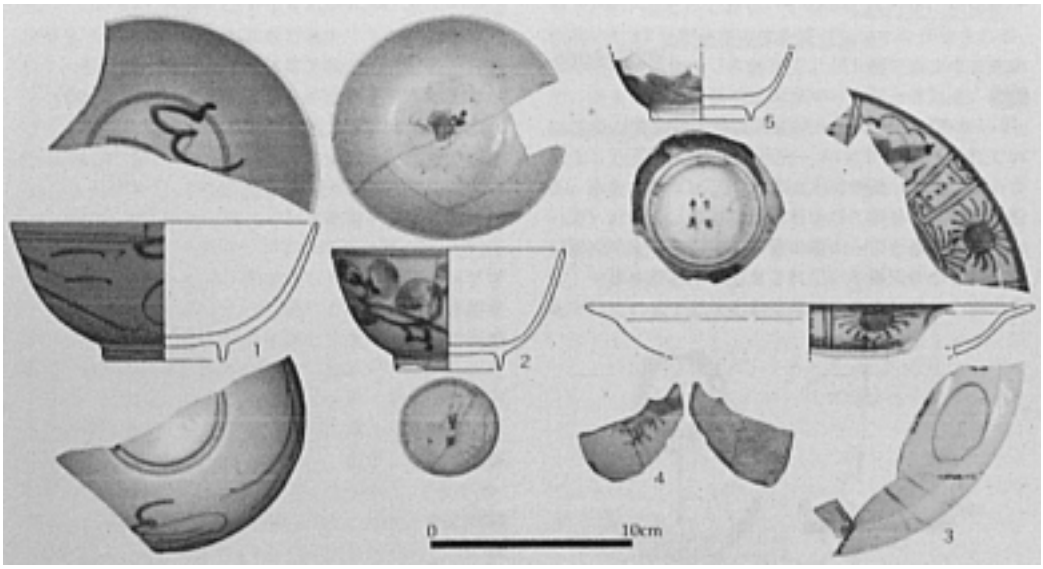


圖 16　台南出土肥前青花瓷(1660-1680 年)



圖 17　台南市民族文物館舊藏肥前青花小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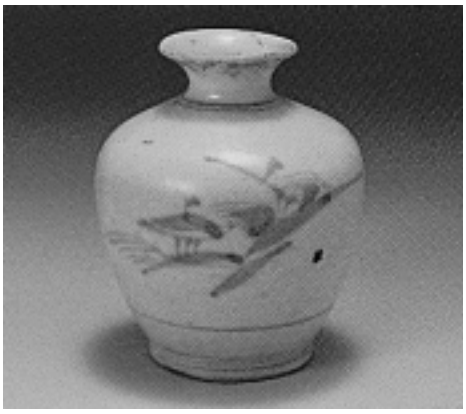


圖 18　泰國 Thao Khot 寺出土肥前青花小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9　飾煙草紋的 Albarello（漆蓋為後加）



圖 20-a　國立台灣博物館藏接收自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 Albarello



圖 20-b　同上(斷面)



圖 20-c　同上(器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1　陶煙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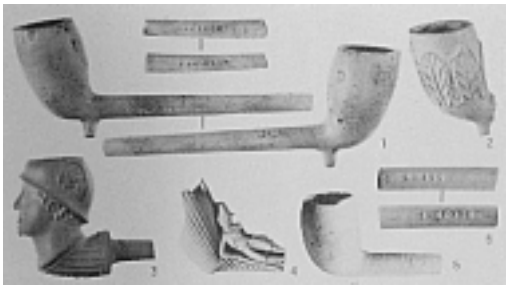


圖 22-a　陶煙斗（東京新橋車站遺址出土）



圖 22-b　東京汐留遺跡出土的陶煙斗



圖 23-a　陶煙斗（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23-b　同上(跟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4-a　陶煙斗線繪圖



圖 24-b　豪達市市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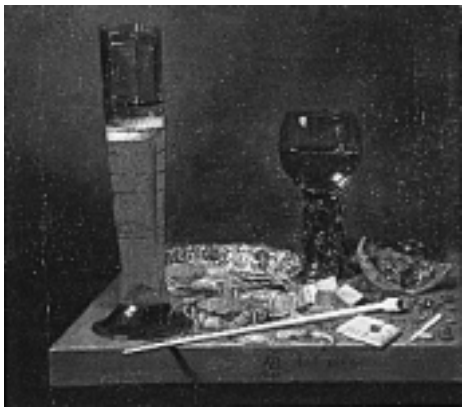


圖 25　17 世紀荷蘭靜物畫中的陶煙斗



圖 26　日本出島荷蘭商館遺址出土陶煙斗



圖 27　荷蘭人喫煙圖（1801-1804 年）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